



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04-1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02

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

顧 春 芳

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 人文学論集 抜刷

第35集 (2017年3月)

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

顧春芳

內容提要：古文辭學派是日本江戶時期最有影響的一個文學流派，它是李攀龍與王世貞的復古文論為其主導思想。本文以古文辭學派的領袖荻生徂徠及門下弟子服部南郭對李攀龍詩文的推崇展開，重新解讀了服部南郭為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所作的《附言》，從而看到了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這一舉措的真正意義在於強調了學習明代宗唐詩學的重要性。

關鍵詞： 重新考訂 李攀龍 唐詩選 明代宗唐詩學

服部南郭（1683—1759年）重新考訂的《唐詩選》，於享保九年（1724年）由嵩山房小林新兵衛刊刻出版，在目錄後有“集採共計一百二十八家，詩選統載四百六十五家”，至於服部南郭所據為何種版本，自有專家考證，容不贅述。重新考訂的《唐詩選》前面除了有李攀龍所作之序以外還有服部南郭所作的《附言》，書後有荻生徂徠所作的《題》。

關於服部南郭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中國與日本的學者都做過很多研究，最多的是關於題李攀龍編的《唐詩選》的版本考證，其中都提到了服部南郭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而南郭為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附言中的一段話也成了辨識偽託版本的根據¹。在關於南郭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其針對當時偽託李攀龍選、袁宏道校的《唐詩訓解》在江戶文壇的氾濫，還了李攀龍《唐詩選》的本來面目。而服部南郭重新考訂的《唐詩選》刊刻後，影響是非常之大，一版再版，在江戶的文壇流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²，成了文人學習唐詩的範本。而筆者以為服部南郭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還有著教導諸學子如何接受明代宗唐詩學的一面。本文擬通過對服部南郭為重新考訂的《唐詩選》所寫的《附言》的考察，並結合荻生徂徠對當時江戶文壇接受明代詩學的看法來展開論述。

¹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其中值得關注的有查屏球的《李攀龍〈唐詩選〉評點本考索》（收入章培恆、王靖宇主編的《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55-285頁。）其中談到了日本收藏和註釋的版本4種。杜治國的《確立詩歌的正典—李攀龍詩論、選本及創作研究》附錄一，題名：《李攀龍編〈唐詩選〉的版本和館藏情況》（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526-551頁。）其中也列入了日本評點和考訂的4種。而這兩者所述的日本的4種版本中都有服部南郭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而有木大輔的《唐詩選版本研究》（日本，好文出版，2013年。）一書中則在第五章“嵩山房小林新兵衛による《唐詩訓解》排斥”（“《唐詩訓解》被嵩山房小林新兵衛所排斥”）中論及服部南郭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並以服部南郭所作《附言》指出了《唐詩訓解》乃是偽託李攀龍之作。

² 關於這一點，參照日野龍夫《服部南郭の生涯と思想》一文，日本思想大系37《徂徠學派》，日本，岩波書店，1972年，526頁。

服部南郭重新考訂李攀龍的《唐詩選》，與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文的重視是分不開的，下面擬在這方面展開論述。

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界，朱子學派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學派，可以說程朱理學已經滲透到了儒學界的方方面面，當時崇尚儒學的文人大多讀的都是二程與朱熹的所註之書。而與此同時，明代的反對程朱理學的文學思想也傳到了日本，並對一部分文人產生了影響。古文辭學派是荻生徂徠（1666—1728年）接受了其中以李攀龍（1514—1570年）與王世貞（1526—1590年）的復古文學主張而創建的。而在李攀龍與王世貞二人之中，荻生徂徠則更為推崇李攀龍。

先看荻生徂徠曾多次提到的“奉于鱗氏之教”之類的言論。

荻生徂徠在《復安澹泊》（第三書）中這樣寫道：

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於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發，而不復須就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嗽蔗。於是回首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³

這封信是寫給朱子學派的儒學者安積澹泊的，荻生徂徠在這裡提到自己中年得到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著作，然而卻無法讀懂。自那時起為了讀懂李、王之文，發憤讀東漢以前的古書，堅持數年。所讀古書自六經始，至西漢終，而且是“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即讀了無數遍。而這一切都是“亦如于鱗氏之教者”。在讀懂讀透了東漢以前的古書之後，再讀李、王的文集，就猶如啃甘蔗一般，甘之如飴。再回過頭來看後儒所作的註解，就知道其中的謬誤了。在這裡可以看到，荻生徂徠所強調的是李攀龍的“文必秦漢”的文學主張。

再有荻生徂徠在《學則》一文中這樣寫道：

……吾奉于鱗氏之教，視古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視，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旦暮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遊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為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為。⁴

在這裡，他明確地談到，古修辭就是“奉于鱗氏之教”才得以習得的，而且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程度。荻生徂徠說自己彷彿“置身仲尼之時，從遊夏親受業也”，即與子遊和子夏一起在孔子那裡受業。也就是說他於古文辭，已是了然於心。《學則》一文乃是荻生徂徠表明其復古志向的重要著作之一，文章以“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結尾，足可見復古文學思想已通過李攀龍的著作對他起了很大的影響。至於“如于鱗氏之教”的說辭在他給其他文人的書信中也見到，此處不再一一例舉。

在荻生徂徠看來，李攀龍的詩文足以與建安七子中的曹子建媲美。他在《與墨君徵》

³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八。

引自《近世儒家人文集集成第三卷》，ベリかん社，1985年。以下略。

⁴荻生徂徠《學則》，《徂徠集》卷十七。

（第七書）中這樣寫道：

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按《從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弗傳。而公議無偉長，未審靈運時別有所見否也。于鱗實擬議成變化，蓋取諸懷抱，與古人合契耳。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謝客自謝客，何干建安？足下宜識此意，要不為英雄欺可也。⁵

在這裡“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就是對李攀龍詩文的評價。

而荻生徂徠將李攀龍的詩文定位定得很高，他編纂了文集《四大家雋》和《古文矩》，他在《答屈景山》（第一書）中這樣寫道：

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嘗作為《四大家雋》，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辭也。……⁶

在這裡荻生徂徠指出“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只有韓愈、柳宗元、李攀龍、王世貞四人，因此編了《四大家雋》，作為門人的教科書，而四人中他尤其推重的是李攀龍與王世貞的文章。而《古文矩》則只選了李攀龍一人的文章。在《古文矩序》中有：“吾黨之士欲學古文辭者當先讀《四家雋》，欲通《四家雋》者，當先讀此書。”其中的《四大家雋》即為《四家雋》，此序雖為弟子佐美澗水所作，然卻是荻生徂徠之意，從中可見他對李攀龍文章的態度。

而由荻生徂徠編選的《唐後詩》對李攀龍詩的定位則更高了，荻生徂徠在這部以明代前後七子的詩為主的明人詩集中，所選李攀龍的七絕竟達三百首。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作的評價，也是非常之高。他在為《唐後詩》所撰寫的《唐後詩總論》中這樣寫道：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即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視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為不可及也。……⁷

從這段話中可見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的定位是相當之高，因為這段話是在他列舉了胡應麟、王世貞、王世懋、何景明等人的詩評後說的。其中對諸公的評論是“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的概括，而“獨余則謂”才是重點，荻生徂徠稱讚李攀龍的詩能“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又指出“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可見這些詩篇無一不經過他的細細品味，而正是這樣的“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才是“不可及”。

⁵ 荻生徂徠《與墨君微》（第七書），《徂徠集》卷二十四。

⁶ 荻生徂徠《答屈景山》（第一書），《徂徠集》卷二十七。

⁷ 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見《唐後詩》。據新瀉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以下均略為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文的推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古文辭學派的發展，服部南郭在這方面可以說是深受其影響。

他在《送大潮師序》中這樣寫道：

左氏司馬亡後，世無左氏司馬，蓋北地而前哉。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壯哉遷也，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川。……。

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喁，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至乃發憤忘食，修辭相劇，奮呼藝苑，而復古之業，蓋千餘年而皦皦如也。夫夫輩蓋謂令我與古人同出乎？我則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旦暮遇之。猶且避之三舍者，生有所先後也。則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也。而天實生夫輩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其能為夫輩，而上周旋於左氏司馬者，天不生乎若人。……

8

序的開首就表現了他對左丘明和司馬遷的仰慕之情，而這裡的“左氏司馬”就是古文的代名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攀龍最為推崇的就是《左傳》和《史記》。王世貞也評說李攀龍作文“多自左丘、子長、《韓非》、《呂覽》”⁹。而“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喁，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則是對明代以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與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遙相應應，成就了復古大業之舉的感慨，並表示了自己願為提倡復古而竭盡全力。“我則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即為此指。在這裡還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旦暮遇之”句，是出自荻生徂徠的《學則》中“奉于鱗之教”的那段話。

而服部南郭對李攀龍的推崇，也體現在他所作的《唐後詩序》中，序中在談到明人詩時這樣寫道：

明人蓋彬彬如，作者是富。不乃欲創哉。然其監不遠。才子猶懲戒其設心若是，率由舊章，合乎古人。遂乃深造以逢其原。蓋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唐後而有詩也。唯是當局者迷，旁觀則悟。爛熳奪目，當時亦眩焉。蓋漢魏與唐，自然而已。明人衡以其才，乃奮臂窺其奧，則千鈞之重，移於銖兩。即滄溟之精刻，其刪也於明，亦唯以人取，以時取。謂之明可也。謂之唐不可也。非德不純，勢然也。漢魏自盡漢魏，不知後有唐。唐自盡唐，未能前盡漢魏。明人並兼之，乃不能自然。即不自然，其才之盡也。……。¹⁰

在這裡他指出了明人作詩模仿漢魏詩與唐詩，認為這才最能體現復古主旨，因為李攀龍一直強調“詩必盛唐”，其中的“即滄溟之精刻”之句，既是對李攀龍編選《唐詩選》的看法，也是對李攀龍刪詩的理解。

⁸ 服部南郭《送大潮師序》，《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

⁹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十九。

¹⁰ 服部南郭《唐後詩序》，見《唐後詩》。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二

荻生徂徠對李攀龍詩文是非常推崇，他要求本派的弟子要以李攀龍編選的《唐詩選》為學習唐詩的範本，這也是服部南郭重新考訂李攀龍編選的《唐詩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儒學界，很多人都不知《唐詩訓解》乃是偽託李攀龍之名。《唐詩訓解》全書名為《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原題署為“濟南滄溟李攀龍選，公安石公袁宏道校，書林獻可余應孔梓”。本文所引乃出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田原勘兵衛刊《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¹¹

關於荻生徂徠對《唐詩訓解》的排斥，也有不少學者提到過，如藍弘岳就這樣說道：“白石認為應該學習明代古文辭學派的詩，雖說他以《唐詩訓解》作為學詩的教材，但卻並不全面排斥宋詩。而徂徠則不僅批判宋詩，還將《唐詩訓解》作為偽書而排斥。”¹²荻生徂徠為何會如此排斥《唐詩訓解》，這與他對袁宏道與鐘惺的批判是分不開的。荻生徂徠在《譯文筌蹄言十則》中這樣說道：

……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覓。如此日久，自然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鐘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甚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脈。予近作柏梁餘材，即是物也，未成集。¹³

這段話是教人如何學唐人詩的，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鐘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的論述，關於這一點，荻生徂徠在《唐後詩總論》都有論及，尤其是對袁宏道與鍾惺詩學理論的批評，言辭甚為激烈。其中這樣寫道：

嗚呼，二子生宋元後，而自謂不庸、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鸞花而別為春，離婁、公輸子非規矩則不能為方圓，即其自詭神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翅為詩道言哉。祇其為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醞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

¹¹ 《唐詩訓解》，（題李攀龍選，袁宏道校《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田原勘兵衛刊。）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

¹² 藍弘岳《徳川前期における明代古文辞派の受容と荻生徂徠の〈古文辞学〉》（《徳川前期明代古文辞派の受容と荻生徂徠の〈古文辞学〉》）。日本《日本漢文學研究》第三集，2008年3月。53-54頁。原文如下：白石は明代古文辞学の詩を学ぶべきだと考えて、『唐詩訓解』をも教材として使っていたが、彼は必ずしも宋詩を排除し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徂徠は明確に宋詩を批判して、『唐詩訓解』をも偽書として退けた。”

¹³ 荻生徂徠《譯文筌蹄言十則》。《徂徠集》卷十九。

人物以轉盛趨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後，特收戴氏二則，以立之防已。¹⁴

這段話是針對袁宏道與鍾惺“極口詆毀王、李，為膚、為熟、為狹、為模擬”¹⁵而言的。袁、鍾二人自視甚高，以為自己“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但在荻生徂徠看來，即便是他們自詡為“神奇”者，也不過是胡應麟所說的“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而其中的“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更是對李攀龍詩的肯定，此處將李白、杜甫的詩與《詩經》並提，旨在強調表現“色相”的“辭”的重要性。他指出詩之聲律隨著時代而變，詩之體也因人而異，唯獨表現“色相”的“辭”是不變的，因此李杜詩中之辭所表現的“色相”與《詩經》中的是一樣的。他還說袁宏道與鍾惺的為人是“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醜藉，喜放縱，惡拘束”，因此危害極大，所以在《唐後詩總論》的最後，他特意引了戴道默的二則批評袁宏道與鍾惺的詩論，並以此為防。

荻生徂徠在批評宋詩時也提到了袁宏道，他在《答崎陽田邊生》中這樣寫道：

……獨宋時學問大闡，人人皆尚聰明以自高。因厭主情者之似癡，遂更為伶俐語，雖詩實文也。蘇公輩。為其魁首，餘波所及，明袁中郎、錢蒙叟以之。胡元瑞所謂詩之衰莫衰乎宋者是也，又無它故也，主意故也。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亦主意故也。¹⁶

這段話是說以蘇東坡為首的宋詩，以文為詩，而袁宏道乃承其餘波，“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即為此指。

再看服部南郭在為重新考訂李攀龍的《唐詩選》所作的附言中是如何說明《唐詩訓解》是偽託之作的。附言中這樣寫道：

世有《唐詩訓解》，其書剽襲《唐詩選》及仲舒注、仲言解等。偽選列藝文，而詩全用于鱗選，出入一二。其所題目既是不知滄溟者所為，序則文理不屬，始無意義，中間引道子，數語出中郎他文。且中郎於滄溟，不啻仇視，則亦不知中郎者所為。總評中竿濫大甚。評注取蔣、唐，頗為刪補，唯是拙工代斷，不救傷指，其他謬妄，不可勝計。要之，于鱗嘉隆之間為一代文宗，中郎雖後，亦別為一家，風靡晚學。於是或書賈閭師資二家聲譽為講張之具，並署篇端。所倩村學究不辨菽麥，迺急求錢，致此鹵莽已。于鱗選貴乎精嚴，毫釐出入，或謬千里。故今所考訂，不得不為于鱗雪冤，略贅數語，以發其覆。若夫寒鄉乏挾書，訓解亦非無一助，要辨其真，不眩其偽，則不必瑕殄。¹⁷

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對《唐詩訓解》序的批判。南郭指出此序文理不通，開頭兩句就沒有什麼意義，中間引用的“道子”等語，是出自“中郎他文”。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唐詩訓解》

¹⁴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據新瀉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¹⁵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據新瀉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¹⁶荻生徂徠《答崎陽田邊生》。《徂徠集》卷十九。

¹⁷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的序是如何用袁宏道的其他文章拼湊的。《唐詩訓解》的序文如下：

詩之為教，溫厚和平。詩之為品，理趣機局。今之為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於理趣機局，不能全肖，況溫厚和平而易言哉？唐以詩賦士，士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窮工極變，於詩無所不備。批李于鱗之文，險如舞女走竿，活如市兒弄瓦，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坡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于鱗之文亦然，于鱗之詩不必唐，不必不唐；至其評唐詩，則又以一人之心，出沒於唐人之集，以唐人之心，供玩於一人之手，故著實體貼，不落權設窠臼。其溫厚和平者刊錄之，其理趣機局者點綴之，使習詩者開卷了然，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置唐人於誦詩者之前，無弗貌其真也；置誦詩者於唐人之側，靡弗合其竅也。于鱗之評詩盡之矣，其有益於詩教，顧不大歟？孔子刪三百篇詩以成經；于鱗解唐詩以入經。經者常也，不可易之也；經者久也，不可朽之意也。詩教不能泯於世，則于鱗之訓解，當與日明水流同演映於無窮耳。人心各自有唐，幸勿以世諦流布，視李于鱗訓解，則得之。公安袁石公題。¹⁸

先看“道子”之語，系出自袁宏道的《識雪照澄卷末》一文中，原文為：

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瓦，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¹⁹

在這裡可以看到《唐詩訓解序》將“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改成了“批李于鱗之文，險如舞女走竿”。將袁宏道在《識雪照澄卷末》中對坡公的評論改為對李攀龍的評論。

而其中的另外一些語句則可在袁宏道的《郝公琰詩敘》一文中找到，《郝公琰詩敘》中這樣寫道：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為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即今之窗課也。今代為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餘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勢之沈、宋也，至大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為家大史，是為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為詩為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

¹⁸ 《唐詩訓解序》，（題李攀龍選，袁宏道校《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田原勳兵衛刊。）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

¹⁹ 袁宏道《識雪照澄卷末》，見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文學名著第六集，第十五冊，《袁中郎全集》，台灣，世界書局，1963年。

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於難公琰哉？²⁰

從這段引文中可見《唐詩訓解序》中的“今之為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唐以詩賦士”，“士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等句皆出於此文。關於詳細的對比，可以參考有木大輔的《唐詩選版本研究》²¹，其中將《唐詩訓解序》與袁宏道的這兩篇文章中的一字一句都作了比對。

其實還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附言中的“且中郎於滄溟，不啻仇視，則亦不知中郎者所為”之句，明確指出了袁宏道是極力反對李攀龍的復古文學主張。因此這篇署名“公安袁石公”的序當是偽作也是毋庸置疑的了。可以說附言中關於《唐詩訓解》的這段論述，從一開始就指出《唐詩訓解》乃剽襲《唐詩選》及仲舒注與仲言解而成，其中所選詩看似全用李于鱗《唐詩選》，但卻有所出入。一直到後來指責《唐詩訓解》的總評是“竽濫太甚”，且其中的評注取自蔣、唐，而又“頗為刪補，唯是拙工代斲，不救傷指，其他謬妄，不可勝計”。都是為了說明《唐詩訓解》乃是偽託李攀龍之名。服部南郭還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唐詩訓解》這種刻本，乃是因為“于鱗嘉隆之間為一代文宗，中郎雖後，亦別為一家，風靡晚學”，所以書商借李、袁二人在文學界的聲譽作為行騙。而書商所託《唐詩訓解序》的代為捉刀之人則急於求錢，根本不了解這些情況，就搬用了袁宏道有關談論詩文的文句，胡亂拼湊了一下，現出一些袁宏道文章的筆意，以假亂真。服部南郭以為“于鱗選貴乎精嚴，毫釐出入，或謬千里”，因此不得不為李攀龍雪冤，還李攀龍《唐詩選》的本來面目。

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為當時江戶的儒學界將這部偽託李攀龍編選的《唐詩訓解》視為最好的學習唐詩的範本。下面我們再來看一看李攀龍的《唐詩選》在日本的傳播情況。

關於李攀龍著作的傳入，德川前期的儒學大家朱子學派的領袖藤原惺窩（1561-1619年）的弟子永田善齋（1596-1664年）就有提及，在他的《膽余雜錄》中有關於《唐詩選》及《七子詩集》、《白雪樓詩集》、《滄溟集》的議論，其中說到《唐詩選》裡的註解是“好的當”²²。藤原惺窩的另一個弟子那波活所（1595-1648年）在他的《活所備忘錄》卷二中也記有“李滄溟著《唐詩選》甚愜素心，學詩舍之何適哉？”由此看來此時李攀龍的《唐詩選》已受到文人的喜愛，只是永田善齋與那波活所讀的究竟是李攀龍《唐詩選》的哪種刻本就無從考究了。在他們之後，儒學家貝原益軒（1630-1714年）對李攀龍的《唐詩選》極為讚賞，他這樣讚道：“集詩者甚多，獨李攀龍之所輯唐詩選最佳……且其訓解亦頗精詳”。²³在這裡他稱道李攀龍的《唐詩選》最佳之後又提到了《訓解》，而他所著的《初學詩法》中的《考用書目》中也列出了《唐詩訓解》。在貝原益軒的倡導下，《唐詩訓解》就作為李攀龍編選的《唐

²⁰ 袁宏道《郝公琰詩敘》，見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文學名著第六集，第十五冊，《袁中郎全集》，台灣，世界書局，1963年。

²¹ 有木大輔《唐詩選版本研究》第五章“嵩山房小林新兵衛による《唐詩訓解》排斥”，（《唐詩訓解》被嵩山房小林新兵衛所排斥）。日本，好文出版，2013年。

²² 永田善齋《膽余雜錄》。據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所藏本。

²³ 《格物餘話》，見《益軒全集》卷之二，第328頁，益軒會編撰，1910年。

詩選》在文人中廣為流傳。據資料記載，荻生徂徠在青年時期，就讀過《唐詩訓解》，並將之抄寫。他在《護園雜話》中稱《唐詩訓解》的抄寫本為“此南總之舊物，後足見予之所以勤也。”²⁴所謂南總，是指南總門時期，也就是荻生徂徠自十四歲至二十七歲隨父流放在上總國長柄郡的那段時間。而與荻生徂徠同時的朱子學派的儒學家新井白石（1657-1725年）也把《唐詩訓解》作為門人的教科書，白石的同門師弟祇園南海（1676-1751年）也非常推崇《唐詩訓解》。還有當時京都詩壇的領袖鳥山芝軒（1655-1715年）也把《唐詩訓解》作為學習唐詩的必讀書。以上種種，足可見那時《唐詩訓解》在文人中的影響之大。

荻生徂徠對《唐詩訓解》系偽託李攀龍所作也有言及，他在《與平子和》（第二書）中寫道：“數十年前，宿學老儒，尊信三體詩、古文真實至於四子五經並矣。殊不知周弼一無名男子，林以正書賈也。近來漸覺其非，而以《唐詩訓解》代之”。²⁵這段話是說他數十年前是如何接受《唐詩訓解》的，但也就是在這封信中又有“于鱗豈有《訓解》哉”之語，明言《唐詩訓解》絕非李攀龍所編選。由此可見，荻生徂徠在數十年前並不知《唐詩訓解》偽託李攀龍之名，可在中年以後研讀了大量的明代詩學者作及李攀龍的詩文，並深得其真髓，之後再看《唐詩訓解》，就知其是偽書了。看到眾多文人都不知《唐詩訓解》系偽託李攀龍所作，荻生徂徠不由為之擔憂。當時的情況正如服部南郭在附言中所說的那樣“寒鄉乏挾書，《訓解》亦非無一助”，很多寒門學子都以為《唐詩訓解》是李攀龍所編，人手一冊。在這種情況下，還李攀龍《唐詩選》的本來面目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這也就是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三

上面談到了《唐詩訓解》在江戶儒學界的氾濫，那是因為文人都不知其為偽託李攀龍的《唐詩選》，由此看來，只有找出其真正的原因，並找到解決的方法才是第一要務，筆者以為服部南郭的附言正是為此而作的。下面我們就附言來展開論述，附言的開首這樣寫道：

近體詩盡於唐，盡也者，盡善之謂，而莫善於滄溟選。蓋後世祖述唐人者，家選戶論，大抵宋人好自用其調，絕響六雅，即所選若論，漆桶掃帚，亦惟摸索而已。及南宋嚴滄浪，豁然眼目，全象始見。雖然有來者，不能聞然，然止論之，未遑選詩。明興，高廷禮《品彙》、《正聲》出，而唐人諸家，玄黃不蔽，詩亦簡拔神駿，冀北遂空。滄溟繼興，蓋猶以廷禮為旁通多可，芟柞益嚴，掄選數百首，唐詩之粹森如也。後有唐仲言解及十集，要其所出入，亦惟首鼠高李間，不足列之選者。他若鍾氏《詩歸》，以沙投金，非再經淘汰，無見其真。故唐詩莫善於滄溟選，又莫精於滄溟選。²⁶

服部南郭在附言的開首就提出了所有的《唐詩選》“莫善於滄溟選”，接著就將後世的唐詩選集及有關唐詩的詩論作了一次梳理。指出直至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才“豁然眼目，全象始見”，可惜的是“然止論之，未遑選詩”。而對明代高棅的《唐詩品彙》、《唐詩正

²⁴ 荻生徂徠《護園雜話》，見《續日本隨筆大成》第四卷，第104頁，吉川弘文館，1981年。

²⁵ 荻生徂徠《與平子和》（第二書），《徂徠集》卷二十二。

²⁶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聲》，他是很看重的，後文否定其他唐詩選本時所說的“亦惟首鼠高李間”即為明證。但服部南郭指出李攀龍所編《唐詩選》對所收唐詩的篩選更為精嚴，所以說李攀龍的《唐詩選》是繼高棅《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之後最好的唐詩選集。至於在李攀龍之後的唐汝詢的《唐詩解》等則都是“亦惟首鼠高李間，不足列之選者”。而他對鐘惺的《唐詩歸》的批評措辭則尤為激烈，說它是“以沙投金，非再經淘汰，無見其真”。南郭在梳理之後得出了“唐詩莫善於滄溟選，又莫精於滄溟選”的結論。接著南郭又針對當時的“滄溟選過刻”之說，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附言中這樣寫道：

人或謂滄溟選過刻，然予則謂後世諸家紛然，邪路旁徑往往秦塞，初學進步一左，蹶然陷大澤。故取路之法，明為之標，而後不容田夫欺。又譬諸入崑岡采玉，玉石磊珂，愚者奚別，非棄廡下，或襲燕石，必遇卞和氏，而後天下知連城。故學詩先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必取其儷。準一立，離明輪工，無施不可。滄溟之刻，安知非嚴師友哉。²⁷

在這裡南郭以為“後世諸家紛然”，然而“學詩先擇其善者而從之”。何為善者，一是一定的準則，即“取路之法，明為之標”；二是要有像卞和氏這樣的人來選唐詩，真正的好詩才會為世人所知。李攀龍的《唐詩選》就做到了這兩點，所以他說“滄溟之刻”是“嚴師友”，可見南郭是非常讚賞李攀龍的選詩之精嚴。附言中接著寫道：

初學熟滄溟選，乃後稍稍就諸家讀焉，則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諸家則《滄浪詩話》、《品彙》、《正聲》、《弁州《厄言》、元瑞《詩藪》，此其傑然者，亦不可不讀焉。蔣氏所注二三評語，諸家已具，讀之可，不讀亦可。仲言解備之掌故，則往往便於質訪，至其解詩意謬妄居半，不必取也。且詩貴興象，祇謂擾心，胡用喋喋解之為。若夫誦《三百篇》、讀騷、讀選旁及歷代諸家，人人知之，不待具論。博文約禮，雖小伎亦然。²⁸

在這裡南郭指出“初學熟滄溟選，乃後稍稍就諸家讀焉，則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而諸家則是嚴羽的《滄浪詩話》、高棅的《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王世貞的《厄言》、胡應麟的《詩藪》，這些皆為上乘之作，所以不可不讀。這才是南郭所要強調的，即上述的唐詩選集及詩學著作是學習唐詩的必讀之作。如果讀了“諸家”，那麼也就明白了他指出“世有《唐詩訓解》，其書剽襲《唐詩選》及仲舒注、仲言解等”中的仲舒注與仲言解為何物。只是其時文人們還未讀“諸家”，所以南郭就一一說明。所謂的仲舒注即《唐詩選》的蔣一葵箋釋本中的注，仲言解即唐汝詢的《唐詩解》中的評解。南郭指出“蔣氏所注二三評語”都是取自上述諸家，因此“讀之可，不讀亦可”。南郭還指出仲言解中的掌故雖說便於讀者查找，但其中解詩意的部分則是“謬妄居半，不必取也”。且“詩貴興象”，故無需這種喋喋不休的解說。

服部南郭為何要附言中如此強調學習“諸家”的重要性，這與明代的詩學理論並未在當

²⁷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²⁸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時的江戶儒學界得到重視有一定的聯繫。而偽託李攀龍之名的《唐詩訓解》能在江戶儒學界氾濫就是最好的例證。還有，我們在荻生徂徠給江若水的信中也可略見一斑，信中這樣寫道：

吾東方學者，以和訓讀華書，故其病多得意而不得語。吾於崎陽邊生書具道之，今謹附上，伏請賜覽，足下或欲因此一激遂望最上乘。則一二年間東來，目擊道存，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要在棒喝下一汗，而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雖然，足下或能以《滄浪詩話》、廷禮《品彙》、于鱗《詩刪》、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朝夕把玩，詩亦在阿堵中，何必待不佞也？吁不備。²⁹

這是一封給江若水的回信，面對江若水在學習唐詩時所遇到的困惑，荻生徂徠告之有些道理並非一定要由自己在信中說明，只要讀懂讀透“《滄浪詩話》、廷禮《品彙》、于鱗《詩刪》、弇州《卮言》、元瑞《詩藪》”，就能明白作詩之道了，可見當時很多文人都不知道學習詩學著作的重要性。而“何必待不佞也”一則是荻生徂徠的自謙之辭，二則也說明荻生徂徠的論點也是出自於上述諸書。從中也可見荻生徂徠對學習上述諸家詩學理論的重視。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荻生徂徠與服部南郭所重視的“諸家”也是基本一致的，荻生徂徠因是教人讀詩學著作，所以又有李攀龍的《詩刪》。再看附言開頭一段中對高棟的《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的評價，也是出於“推重盛唐之作是高棟向來秉持的立場”³⁰，在這一點上與李攀龍是一致的。高棟在《唐詩品彙》中這樣寫道：

盛唐作者雖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若崔顥律非雅純，太白首推其黃鶴之作，後至鳳凰而彷彿焉。³¹

再看王侁在《唐詩品彙敘》中所錄的高棟論詩之言：“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為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初唐聲律未純，晚唐聲習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為然。”³²從中足可見高棟對盛唐詩歌的重視。而“諸家”中王世貞的《卮言》與胡應麟的《詩藪》亦都是極其推重高棟的《品彙》、《正聲》與李攀龍的《唐詩選》的。胡應麟就有“蓋自高廷禮《品彙》而始備，《正聲》而始精，習唐詩者必熟二書，始無他岐之感”³³之說。因此南郭在附言中強調“此其傑然者，亦不可不讀焉”。

南郭在強調了“諸家”是學習唐詩的必讀之作之後，就將矛頭指向了《唐詩訓解》，他“略贅數語，以發其贗”，指出了《唐詩訓解》乃偽託李攀龍之名。而後又針對一些初學之士的擔憂，寫了下面一段話：

²⁹ 荻生徂徠《與江若水》。《徂徠集》卷二十六。

³⁰ 鄭利華《唐詩品彙》、《唐詩正聲》與明代前期宗唐詩學體系的完善》，日本《人文學論集》34集，2016年3月。143頁。

³¹ 高棟《七言律詩敘目》，《唐詩品彙》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³² 王侁《唐詩品彙敘》，《唐詩品彙》卷首，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³³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中華書局，1958年。

《唐詩選》原本以蔣注行，其辨既具于前，方于麟選時，豈必期後有蔣注。今所考訂，要在見真面目，何憂無注。初學或昧典故，諸書既自巋然，各就考之。可寒陋之士，往往責備一書，蔣注訓解豈備哉？³⁴

在這裡南郭強調了《唐詩選》根本無需蔣一葵的注與唐汝詢的評解。“初學者或昧典故”，或憂無注，都可以從上述諸家中考之。可那些寒陋之士，往往希望一書中既有注又有評解，樣樣都具備，只是《唐詩訓解》豈能成為這樣的書呢？可見重新考訂是非常必要的。

南郭的考訂原則如下：

原本諸刊頗多，或有增二三者，今不取也。如字有異，多從原本尤善者。兩可難裁，則就《品彙》、《詩刪》、《詩解》、《十集》考之，從其多且正者。³⁵

南郭重新考訂的李攀龍《唐詩選》於享保九年（1724年）刊刻後，文人們乃知《唐詩訓解》為李攀龍《唐詩選》的偽託本。又由於服部南郭在附言中強調了學習嚴羽的《滄浪詩話》、高棅的《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王世貞的《卮言》、胡應麟的《詩藪》中的詩學理論的重要性。古文辭學派的弟子及學習唐詩的文人對明代的宗唐詩學有了新的認識，也真正理解了李攀龍為何要提倡“詩必盛唐”。

荻生徂徠對南郭重新考訂的《唐詩選》是這樣評說的：

翁老評滄溟詩，峨嵋天外雪中看，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盡，頓復舊觀，一二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為子遷道。³⁶

這段話前半說的是偽託李攀龍之名的《唐詩訓解》所造成的危害。後半則是說他看到《滄溟選》“頓復舊觀”之後的喜悅之情。因為在他看來李攀龍“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都體現在《滄溟選》中所選的唐詩裡面，《滄溟選》才是學習唐詩最好的範本。而最後的“滄溟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為子遷道”則是對服部南郭的重新考訂最好的評價。南郭考訂的《唐詩選》可以說是在江戶文人中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南郭在世時就出了第四版³⁷，它的影響已不局限於古文辭學派。

結語

綜上所述，荻生徂徠格外重視李攀龍的詩文，他將李攀龍編選的《唐詩選》作為門人的必讀書。可當時的文人都只讀《唐詩訓解》，根本不知此書乃是偽託李攀龍之名。究其原因，

³⁴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³⁵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³⁶ 荻生徂徠《題唐詩選後》，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

³⁷ 參照《服部南郭略年譜》，見田尻祐一郎/疋田啟佑著《叢書/日本的思想家 17, 太宰春台/服部南郭》，明德出版社，1995年。（其中寬保三年（1743年）有“正月，小本《唐詩選》再版”。延享二年（1745年）有“五月，小本《唐詩選》第三版刊。”寶曆三年（1753年）有“九月，小本《唐詩選》第四版刊。”）

是不知明代詩學的緣故。為此服部南郭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並寫了附言。在附言中所強調的“不可不讀”的著作是嚴羽的《滄浪詩話》、高棅的《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王世貞的《卮言》及胡應麟的《詩藪》，而這些著作除了《滄浪詩話》之外，都是明代的，而其中的詩學理論也都以宗唐為主。其中以盛唐詩歌為最的論述也不少，這與李攀龍所提倡的“詩必盛唐”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重新考訂李攀龍《唐詩選》這一舉措的真正意義在於強調學習明代宗唐詩學的重要性。